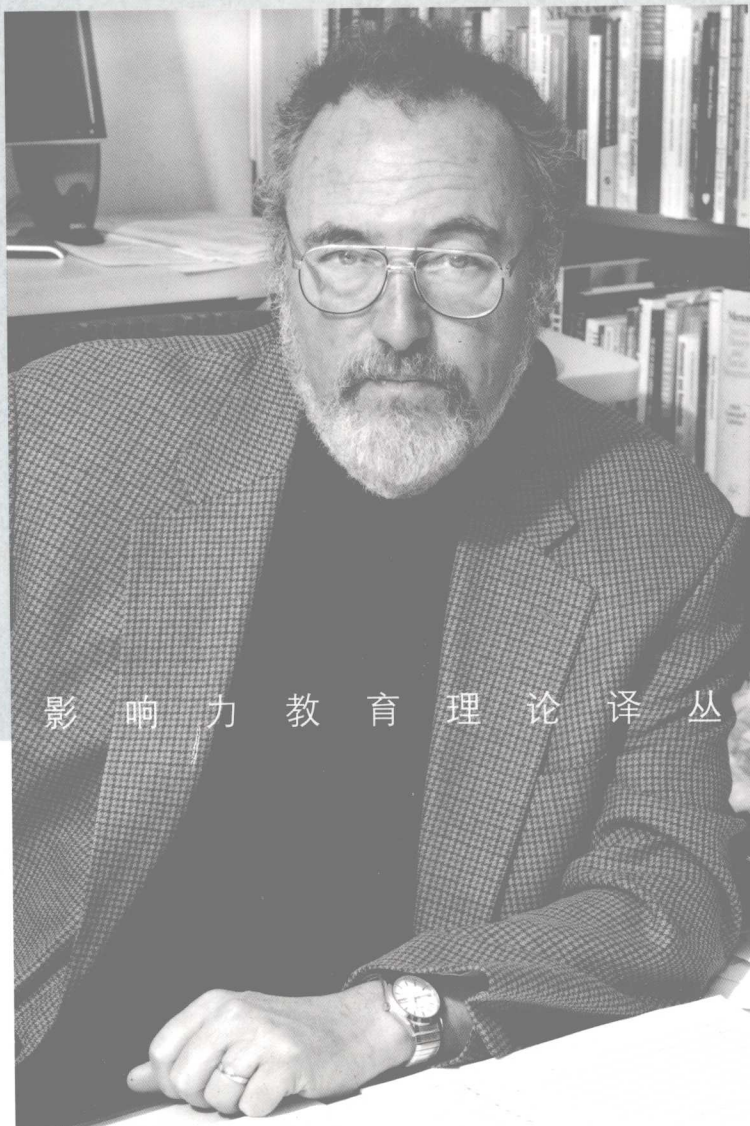


EDUCATION AND POWER

Second Edition



M 阿普尔 集
MICHAEL W. APPLE

影 响 力 教 育 理 论 译 丛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迈克尔·W·阿普尔 著
曲囡囡 刘明堂 译
谢维和 审校

教育与权力

(第二版)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M 阿普尔 集
MICHAEL W. APPLE

EDUCATION AND POWER

Second Edition

教育与权力 (第二版)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迈克尔·W·阿普尔 著
曲因因 刘明堂 译
谢维和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与权力(第二版)/(美)迈克尔·W·阿普尔著;曲囡囡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ISBN 978-7-5617-6115-1

I. 教… II. ①迈…②曲… III. 学校教育—教育社会学
IV. 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9785 号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教育与权力(第二版)

撰 著 迈克尔·W·阿普尔

译 者 曲囡囡等

项目编辑 金 勇

审读编辑 余 强

责任校对 王 卫

装帧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江苏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115-1/G·3547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阿普尔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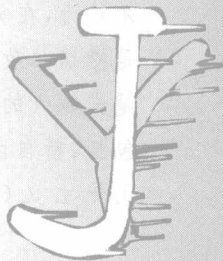
// 阿普尔集序

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W. Apple)这个名字对中国教育学术界来说已不陌生,1979年他出版了《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一举成名,此后一直活跃在教育著述的舞台上,至今仍然文思泉涌,笔耕不辍,展示了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批判教育家形象。

《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2001年首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多次来过中国,对中国的教育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广泛的兴趣。他的思想与成果也越来越受到中国教育界的关注。目前在中国已经翻译出版的著作有:《意识形态与课程》、《官方知识》、《教科书政治学》、《国家与知识政治》、《文化政治与教育》。为了让中国的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阿普尔的教育思想与理论,这次我们将阿普尔的著作集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套阿普尔译丛包括《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官方知识》、《教科书政治学》、《国家与知识政治》、《教育的“正确”之路》、《被压迫者的声音》等共七本著作。这些著作是从阿普尔的30多本著作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的绝大部分著作曾经被翻译成日、法、德、韩、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意大利等多国语言,还有一些著作获得了大奖,如《意识形态与课程》和《官方知识》入选20世纪最重要的著作,《教育的“正确”之路》被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授予杰出著作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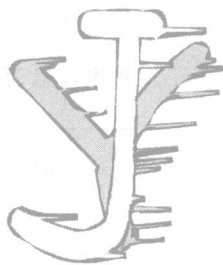
* 序作者袁振国,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从中的每本书都独具特色,能够独立成篇,当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时,又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这套经典译丛基本反映了阿普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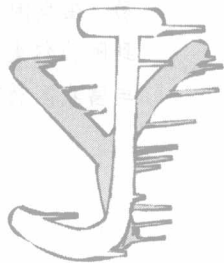
阿普尔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关注意识形态与课程。此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有《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和《教科书政治学》。《意识形态与课程》是阿普尔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使他一举成名,为他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课程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和技术问题,也不是一项中立的事业,它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问题,课程总是陷入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冲突的历史泥沼之中。为此,他针对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从而开启了探讨意识形态与课程关系的先河。在《教育与权力》一书中,他集中关注学校问题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他分析了各种政治力量、学校场所以及师生如何抵制等问题,考察了各种被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非常重要的知识(技术管理知识)。尽管社会的经济水平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拥有高水平的技术,但是真正重要的是用于经济的知识资本。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拓宽视角,借助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以及伯恩斯坦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分析了课程的内容和结构,它们如何被选择以及怎样被组织和传授等等问题,以此考察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教科书政治学》探讨了作为官方知识的教科书的作用,分析了教师的任务,指出教科书对妇女教师,尤其是小学的大多数教师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分析作为课程核心的教科书的政治属性。他尤其关注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和知识社会学,并且提出可以采取的政治行动。

阿普尔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批判保守主义的右派。在此阶段代表性的著作有《官方知识》和《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一版)。阿普尔认为,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变革更趋向于保守主义。在英国是撒切尔政府时期,在美国就是里根政府时期。在保守主义势力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美国的教育政策基本被右翼联盟所控制。这个联盟包括: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s)、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s)、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s)和中产阶级的管理主义(New



middle class managerialism)。新自由主义认为凡是私的就是好的,而公的就是坏的,鼓励竞争与私有化,倡导择校与教育券这样的教育政策;新保守主义主张由国家来控制知识与价值,强调回到“传统”经典,倡导实施统一的国家课程和国家测验这样的教育政策;威权民粹主义有很深的宗教根源,它强烈支持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教育政策,同时强调家庭权威、伦理观念和基督道德的重要性,倡导家庭学校运动 and 在家上学的教育政策;专业管理的新中产阶级是一种新的管理主义,强调测量、评估、效率与标准的重要性,倡导绩效问责和高标准测验这样的教育政策。这四种力量形成保守主义的联盟,阿普尔称这四种联盟的势力为“保守主义的现代化”,它们共同推动了择校、教育券、公立学校私营化、国家课程、全国统一考试等教育政策,《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法是这些教育政策得以合法化的标志。他认为:如果想理解如何变革学校,就必须向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那些人学习,他们不是左派的人,而是右派的人。如果想理解如何进行反霸权的运动,就必须考察使用这些现代权力的人,考察很强势的、处于权力中心的右翼集团,考察他们所做的并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总之,这两本书聚焦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威权民粹主义和中产阶级管理主义的联盟,考察它们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人们接受它们。

阿普尔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以国际的视野拓展他的理论。在此阶段的著作有《国家与知识政治》、《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二版)和《被压迫者的声音》。《国家与知识政治》重点关注国家的作用,生动地描述了美国、新加坡、瑞典、挪威、韩国、巴西等一些国家的案例,深入剖析国家与知识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官方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机构、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被传授,因此探讨学校知识必须考虑到知识的内外背景,也就是要与更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联。同时,本书也研究了帝国的文化政治学,帝国如何进行文化控制,殖民地的社会与文化动力是什么和社会运动怎样从底层向这种控制进行挑战以及社会运动本身的变化过程等等。《教育的“正确”之路》(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章,在继续探讨保守主义右翼联盟的同时,对日益增长的家庭学校进行考察,并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体现出的新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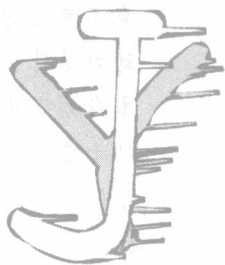


主义进行批判。本书既是一部学术性极强的理论著作,又是一部很有实践价值的教育政策方面的读本,尤其对美国当前的教育政策与未来走向做了非常详实而有深度的分析与解读,对了解美国教育改革意义重大。《被压迫者的声音》更具国际化,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格兰和美国等英语国家的国际化教育实践。阿普尔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在教育领域中到底谁在说和做、有多大的说和做的空间、其效果和意义何在,从而揭示教育剧场中统治者与被压迫者到底是怎么“说”的。总之,此阶段阿普尔试图思考,对一些国家来说,这种国际化意味着什么,例如对南非、巴西、中国等等。他写了巴西 Porto Rico 成功的改革,他与巴西的人们一起工作,也在印度的新德里建立民主学校。他计划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做一些国际性的、成功的或强有力的民主教育的实验,并从事一些批判性的工作。其立场是西方必须向东方学习,北方必须向南方学习,保持谦虚的态度,少些傲慢。

阿普尔的教育思想深受马克思、葛兰西、布迪厄、伯恩斯坦等思想家的影响,又来源于家庭成长的背景;他既是一位深邃的理论家,又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既是一位教育问题的批判者,又是一位民主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他的工作主要是探讨教育中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考察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对教育的影响,检查课程的意识形态、知识和权力等的复杂关系,批判课程中的阶级、种族与性别等问题。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意识形态与课程的关系是什么?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什么是教育的“正确”之路?受压迫者有发言权吗?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分析教育与课程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为批判教育理论和新左派的著名代表,阿普尔始终坚信自己的理念,猛烈批评在美国复兴的右派和保守主义的现代化,积极倡导教育民主之路。尽管他知道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革命”,但他还在不知疲倦地为之奋斗。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理论上的思考,而且是一种实践上的行动。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很高兴看到阿普尔集能够及时地与读者见面,相信这套译丛对繁荣我国教育思想、丰富我国教育理论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会有所启示。

吴晓刚



// 总 序

总

序

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陆续翻译引进了一批批外国教育理论著作,这对促进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理论著作翻译引进的工作有所减弱,在已有的教育理论翻译作品中,也较多的集中于单科性作品,综合性、思想性较强的作品较少,有也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作品和作家,由于没有系统译介,以讹传讹的也不少。为此,我们筹划了这套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选题的重点是思想性、综合性较强,学术覆盖面较广,较具原创性的作品,时间上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为主。虽然这中间有些作品翻译难度较大,但我们也希望不避烦难,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学者同仁共同关心这一工作的进展,为丛书出谋划策,推荐作品,参与翻译,不断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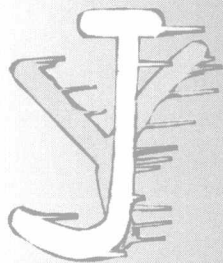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

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

徐 群(浙江师范大学)

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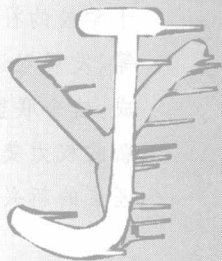


// 1995年版前言

每个人都惊诧地盯着我们部门的头头。这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Ⅶ
很快屋子里就充斥着愤怒和不满的喧哗。这不是她第一次向我们传达“来自上面的意思”了。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这还真是不足为奇。但是对于在那个屋子里的每一个人而言,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从那个时刻起,尽管我们试图阻止教育完全地融入右翼使其加入到经济性的竞争以及使其合法化的计划当中,我们还是在逐步失去我们的阵地。

要使那次会议井然有序地进行很不容易。但是慢慢地,我们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想来听听州教育部和州议会作出了怎样的对于整个威斯康星州的学生最为有益的决定——无论你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大学就读。从下一年开始,所有将来希望从事教职的本科毕业生都需要修一门名为就业教育的课程。这门课程从本质上说是“为了企业自由制度的利益”。与此同时,初级和中级教育层面上的所有学校课程,也就是说从五岁的孩子开始都应该持续地接受关于就业方面的教育。毕竟,你不能开始得太早,是吧?教育只是“人力资本”的提供者,是不是?

我之所以以这个故事来开始,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个保守主义的时代我们最好以我们教师或是学生的身份和经历作为起点。在这里我以Ⅷ
如是开头的原因是,尽管现在华盛顿当政的民主党政府试图(相当无力且并未奏效)在右翼社会议程未顾及到的领域内进行统治,但是就引发争论的原因和已有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他们正朝着保守主义的方向产生了极大的转变。^①对于将要在我们的学校发生的事情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特别是在考虑到当前州层面上的财政危机以及在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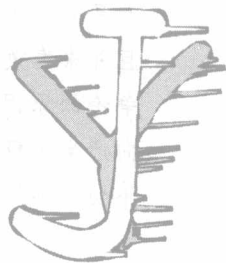
大政党内都奉行基本的保守主义的社会和经济议程的前提之下。我刚才所讲述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隐喻来说明我们的教育生活发生了何种的变化。

让我把这置于保守主义联盟试图在教育 and 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内产生转变的大背景下吧！

保守主义一词的言内之意即宣告了其本质。它是有所保留的。当然也存在其他的解读方式。有的人可以说，当然是带点挖苦口吻的，保守主义认为任何事情在首次发生的时候都不应该有所作为。^②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是有欺骗性的。因为右派现在在很多国家都处于优势地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采取了更为活跃的行动方案。保守主义的政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调整的政治——尽管并非一贯如此，但是说它“在任何事情首次发生的时候都不作为”显然并不能充分地解释在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内发生的事情。^③

保守主义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意义。有时，它会采取防御性的措施，但有时它也会采取主动来改变现状。^④今天，我们可以见证到这两种情况。

正因为如此，将现今教育政治置身于其中的广阔社会背景展示出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同我在《官方知识》和《文化政治和教育》这两本书中不靡巨细所论述的那样，^⑤在二战后指引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制定的社会——民主和谐关系早已出现了崩溃。政府和经济实体内以及在“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运动中的强势团体已经可以来定义——通常是以一种倒退的方式——在教育、社会福利以及其他公共利益领域内引发争论的事宜。教育不再被视为是社会联盟的一部分。这个联盟曾经集合了许多教师、“少数民族”团体、社区活动家、进步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人士协同合作来推进(有限地)制定有关于学校的社会—民主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扩大教育机会、推进收入平等、发展双语和多元文化教育的特别项目等等)。一个新的联盟已经形成，这个联盟在社会和教育政策的制定上有着日益增长的权力。这种新的权力集团整合了新右翼、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处于管理层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提高妇女、有色人种和劳



动者的生活水平(他们中的很多人自然兼具多重身份),而是在于提供人们认可的既能够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利益和纪律性又能够使人们重回拥有“理想的”家庭观、家园以及学校体系的完美过去的教育设置。^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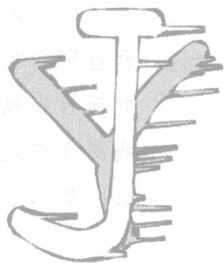
从本质上而言,这个新的崇尚保守主义回归的联盟已经将教育融入了更为宽泛的意识形态义务之中。这个集团对于教育的目标就如同其在经济和社会福祉方面的目标一样。他们认同了那个有力的词汇——自由市场在此领域内的扩展使用。自由市场意味着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责任急剧减少,不断变动的竞争体制不断加强,人们对于经济安全的期望值不断降低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不断泛化,这就如同最近非常流行的赫恩斯坦和默瑞的《钟形曲线》^⑦清晰而又令人沮丧的阐述一样。

美国政治上的右翼非常擅长鼓动人们抨击现存的教育体系及其从业人员。他们经常将在经济领域内出现的危机转嫁到学校上来。因此它的主要成就就是来转移指责——无论是失业还是就业不足,是经济竞争力的丧失还是在家庭和教育领域内“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以及对于统治集团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及其产生的效果,或者是对于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指责等等。“公共的”现在是万恶之源,而“私有的”则是万善之始。^⑧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调整的主体要素往往不在教育中批判性和“改革性”社团的讨论议程之上。特别是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不加批判地转向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时。这种转变使得我们在此书中探讨的教育的社会——政治情境显得尤为重要。

我在这个新前言中将要涉及的内容还是尝试性的,但是它同时回应了我的一些直觉性的思考。关于政治风暴和愤怒的文本性分析,亦或我们是否可以将世界视为一个“文本”——牵强的构成亦可——至少离我们的主旨不远。“我们”有可能正在丢失我们在教育和其他领域内形成的批判性传统所带来的极为重要的洞察力。

我希望我在这里所说的话不会使我听起来像一个头脑僵化的斯大林分子(毕竟,我所说的和我所写的很多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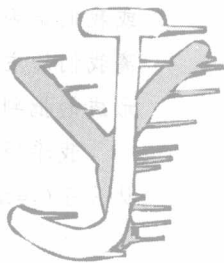


出现的逐步弱化的趋势。)我只是想让大家关注教育和其他一些权力关系之间本质上的关联。这不是出于基本教育论的视角,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复杂也是公认的,但是这一点好像已经被大家所遗忘了。

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关的多重定位的增长是有力而重要的。它预示着我们的话语和我们关于文化和权力之间关系的理解所产生的转变。我们曾经构筑过一系列备受鼓舞的幻像,然而却遭受到了挫折:可以而且必须存在一个超级的话语主体,在其之下包括了所有的支配关系;聚焦于“细微层面”作为政治行为之所在;阐明权力——知识关系的绝对复杂性;我们的政治关注点拓展到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神圣三位一体”之外;在偏离的主体框架中的身份认同是不固定的并且是政治斗争的目标;聚焦于消费行为的政治性和实践性,而不只是着重于生产——所有的这一切都相当的重要,尽管退一步而言并非完全不存在问题。^⑨

在批判性教育和文化的研究当中,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文献不断地增长。但是,我们可能过快地背离了依然充满活力的优秀传统,这些传统能使我们更加明确地洞悉现在在各级层面学校内占主导地位的课程和教学法的本质。因此,举例而言,社会阶级论不能够解释所有发生的事情的事实本身并不能作为否认其力量的借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当然,阶级不仅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外的关系,也是一种解析构造。因此,我们对于阶级的所指以及它如何被应用为一种范畴需要得到不断的解构和思考。我们必须仔细谨慎地对待何时以及如何使用阶级这个词,并且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们以何种多样的形式构成特定的阶级。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假设因为很多人并不把自己定位于某个特定阶级的人或者并不依照理论层面上的阶级定位来行事,所以阶级就已经不存在了。^⑩

如上所述,我自然认识到权力关系是多重的而不仅仅是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神圣三位一体”。我同时也认识到不仅是这些关系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包括这些关系内部的冲突是很关键的。在另外的著作当中,我更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题。《教育与权力》试图将更多的重心放在阶级间复杂的互动之上。但是我并不完全赞同菲利普·韦克斯勒的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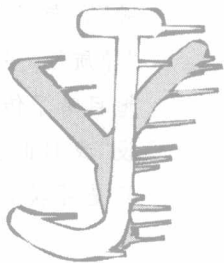


点。他认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整个社会之中,阶级差别都是社会生活中绝对的组织密码。^⑪我对于阶级问题在教育批判工作中遭到了边缘化的境遇深表忧虑。在我们对于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理解当中,将阶级和政治经济的地位凸显出来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当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些互动关系的时候而他们遭到了边缘化,那将是怎样令人心痛的事情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攻势正在席卷全球,这一点证明了我们严肃地对待这些互动关系是多么地重要。

经济领域内的情况也是如此。资本主义也许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但是它仍然是重要的组织力量。也许很多人并不会以阶级首要论所预测的那样去思考和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各种劳动力之间不再存在着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分野。同时也不意味着我们以非简练的方式来看待的生产关系(包括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生产,因为我们看待这两方面的关系的方式有所不同)可以被忽略。^⑫

我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在批判性的教育研究当中存在着非常现实的威胁。尽管在理论的层面上还存在着相当的活力,但是有相当部分的批判性研究还是跟风性质的。它们往往不过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衍生,而且它们似乎也认为一种事物越是难以理解或者它们越多地从欧洲的文化理论中寻找依据(最好是来自法国的),它们就变得更加优越。这种研究方向的快速转换以及其被学院派当中正处于上升状态的新兴中产阶级所部分地把持的事实,低调地否认了他们在其他的传统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或者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来陈述这些成就。他们极力动用其业已失去的在大学的等级制度之内的文化资源,但是在大学,各级学校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反对统治和压迫的斗争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许真的有倒退的迹象,但是这就好比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弃福柯不用,而采纳其他理论家关于社会控制的学说。可是那种否认了社会运动和历史参与者力量的理念是不足以取信于人也同时是违背历史的。^⑬令人遗憾的是,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来势汹汹之中,我们当中的好多人都忘记了我们置身其中的结构性互动的伟大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本可以怒而斥之,但是我们却选择了愤然地疏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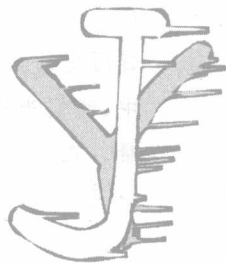
XI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所称之为“后……”的方法通常是非常具有洞察力并且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特别是它对于身份认同政治的重视,对于权力的多样矛盾关系的注重,对于非化约性(non-reductive)分析的关注以及将局部视为斗争产生的重要场所。这些立场过去对我很有启发而且也将继续对我有所帮助,^⑭但是有时我却无法忍受他们被引用到教育领域内。因为他们的矫饰的自负,因为他们对其他方法的生硬定位,因为他们无缘由地认定他们对于正确答案的掌握,也因为他们的拥护者自以为是的疏离真正的学校内发生的真实的事件,他们也似乎将任何对于经济的关注视为与化约性分析思维相一致,因为他们对于概念性事物的混淆,最后就是他们总是在理屈词穷之时振振有词地说一些有思想的教育者长久以来已经了解并且以之为行动准则的常识性的东西。但是我同时还要声明的是,这些说法只是对于部分后现代派方法适用,但是即使只是部分适用也不枉此虑。^⑮

因此,在必要的理念性的和政治策略上的转换与为追赶时髦而常常变化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限。但是某些教育理论家们有时候会不加鉴别地借用某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例如,业已存在相当多将学校置于市场控制下的计划,将学校的功用细分以及给予“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有人会说,这就比方是回到了拥有生产线进行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多样性专门化时期,只不过教育不是受到大规模生产需求的驱动而是受到了多样性消费需求的驱使。^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

然而,如同现在提出的很多新的改革方案一样,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很少一部分是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有些还带着一副“高科技”的面具。如同惠蒂(Whitty)、爱德华兹(Edwards)和格维尔茨(Gewirtz)所说的那样,他们“往往将唯理性作为解决社会,经济和教育问题的基础”。专门化相对于多样化而言是同样有力抑或是更加有力的。^⑰也许“异质性、多样性和地区性”是很多此类改革的借用称谓,但是我们更多地目睹了传统的阶级、性别特别是种族等级制度的复兴。如果我们假设“我们正全面处于后现代思维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当中”,那我们也许只是可以简单地看到处于表面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是显而易见地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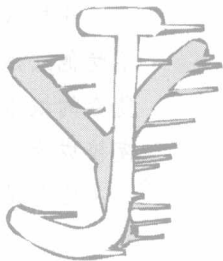
的。但是这样我们就容易意识到这些有可能会重新复活和组织旧的等级制度。^⑮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一系列实践模式不太可能被绝大多数的人所借鉴的事实也是我们应该格外关注的问题。^⑯

《教育与权力》基本上是基于对教育的自我批判性的结构理解之上的。尽管不是倡导经济上的化约性(reductive)研究,但是我们同样要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下的。密尔顿·弗里德曼以及所有倡导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人士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评价这些关系。这些人在公司的董事会、基金会以及我们的各级政府这些权力领域当中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如果他们可以来谈论这些,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些关系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他们是由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构成并不断地获得重新构建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来看待这些关系就有些怪异。在严肃地对待整个的经济逻辑关系、动态机制和将一切都视为经济关系的投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我在《文化政治和教育》一书中指出,本人认为采用这样一种结构性的方式存在很多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尽管我们可以说这种结构是相当灵活的。这种方式曾经试图建立一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以便在单一目标下解释一切事务。这也许是忽略了几乎在每一种情境之下都存在着“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多样的和矛盾的权力关系,而且每一个研究者也都参与了这些关系。^⑰最后,结构性的方式也许会忽视我们的话语是建立在我们的行为和处于监督下的权力关系之上的事实,须知他们本身也可以帮助建立我们的行为和这种权力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严肃地对待。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教育的结构性分析的批评是富有成果的。特别是那些女权主义的和后殖民主义社团所发出的批评尤其如此。^⑱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中间有些批评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讽刺是极不恰当的。

尽管教育和文化的研究以及在社会学中所讲到的“哲学转向语言分析”(linguistic turn)的研究是相当富有成果的,但是我们同样应该记住在教育之内和教育之外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在那里存在着一个粗粝的现实。这种现实的力量根植于结构性的关系当中,而这种关

XIII



系不仅仅是由一个观察者所赋予的意义而构建起来的社会解释。在我看来,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避免忽视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以及你在本书稍后会看到的在文化实践上的粗砺的现实。并且同时应该意识到化约性分析和要素主义分析的危险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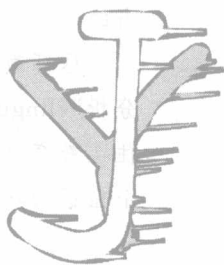
我想说的并不是要否认存在很多“后现代性”的因素,也不是要否认后现代理论的很多见解。我只是想避免对事实的夸大,避免用一种“宏大叙事”来代替另一种。(美国从未存在一种基于阶级之上的宏大叙事,因为阶级、国家和政治经济这些话题只是最近才出现在批判性教育研究的领域内,并且只是偶尔以其在欧洲出现时的面目出现,因为欧洲是很多针对这些解释性工具而引发的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发祥地。我们应该明白,美国的知识史和政治史与那些被后现代批评家所苛评的历史是非常不同的。)化约性分析的滥用使我们无法保证在教育领域内很多人所采纳的后现代的立场可以比其他的立场更能够对这些危险性产生免疫力。

XIV

如果是要展开辩论的话,在格林(Green)和惠蒂之后我们可以说,教育的批判性分析方法的主要落脚点不应该只是“意义及其并不存在的基础,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应该是行动以及其结果,特别是行动机会的构成模式,包括表明和构成所谓行动的意义。”^②

在这一点上,我发现自己与格林和惠蒂的论述相统一。他们说,“结构性情境不能仅仅假设他们不存在,而是要认为他们贯穿始终,这样在行动上才能够如鱼得水,单就我们的思维而言永远不能达成这个任务”。^③这就是我完成本书的一个原因。——来认真考虑围绕在学校周围复杂的结构性的和文化性的情境,来发现这些情境之中的漏洞并且以此来寻找批判性行动的活动空间。

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个人的经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受他或她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作为一名成长在一个极度贫穷的城市当中的普通劳动阶层的人,我积极地参与民权运动,通过读夜校成为一名内城学校的教师并最终成为教师工会的主席。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是蕴含着一种愤怒的力量。当我看到这个社会当中为数众多



的人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年也许会换成月、周、天甚至是分钟)的时候,我愤怒了。当我走进学校看见我的朋友们在走廊、储藏室甚至是厕所里教学的时候,我愤怒了。是什么样的社会可以这样来对待它的孩子?令我同样愤怒的是,权力集团将所有的指责都强加于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学校、勤劳工作的教育者和社区活动家,现在他们又将矛头指向亲子之间的遗传基因,^②而这些都是他们的贪婪和误导性的政策造成的。

然而普通的民众是不能被压服的。他们总是单独的或是集体的行动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如此。这也是我在本书中想要传达的信息。我们的语言体系或是我们的视角也许会忽略这个事实,特别是当我们强调的是效率,采用的是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以及将人视作资本并将其作为结构性力量中的傀儡的时候。也许我们认为他们只是由我们的“话语”的组织而存在的,因此他们在更加“进步的”学术团体当中没有真正的代表和载体。

当然,我们在前面所说的语言,即官僚主义的语言,统治了我们的生活,诸如市场、利润和统计者的底线之类的语言是流传的更加广泛的语言。这可以引导我们失去判断力和记忆力,并且使我们相信,只有这种中立的技术性工具的使用才能够解决一切在学校内和整个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当然是从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问题。)

就以我们最近非常痴迷的认定管理体系和减少成本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和提高生产率”为例。这些技巧并不是中立的。效率,官僚主义的管理体系和经济模式可以适用于任何场合——这些都是伦理概念。要采纳他们涉及了道德的和政治的选择问题。他们的制度化需要被理解成为文化权力关系的一个例证。“在政治、文化和道德选择中的社会安排的因素消失了或者显示出作为中立的技巧性的事物的话,……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文化和政治的霸权。”^③要使得这些谅解和组织的形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必须尽力地去除或者将那些真正有威胁的可行性方案边缘化。(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④这就是现在的事实情况,这也是我想要揭示事情的原委以及在教育当中占统治地位的做法的原因。

